

T9602

女人扶犁？——女拖拉機手在中國

余敏玲

《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抽印本

2006年8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女人扶犁？——女拖拉機手在中國*

余敏玲**

哦！火犁，你是鋼鐵的戰馬
火犁，你是我們親愛的戰友
你發出愉快的聲音
我們已到了開耙時候
我們走遍田野
駕著神馬馳行！……

1950年6月3日，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在黑龍江省德都縣成立。隊員們駕駛著插上紅旗的拖拉機，齊聲歡唱拖拉機之歌。¹女拖拉機手是中共建國之後亟欲塑造的一種社會主義新人典型和新中國婦女的模範；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實踐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提倡的新民說。

清末以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爲了救亡圖存，因此有塑造新國民之議。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梁啟超的〈新民說〉，強調新國民需與國家形成命運共同體。這些知識分子認爲中國的「舊國民」

* 本文承蒙國科會的資助（計畫編號：NSC91-2411-H-001-076）。在此特別感謝定宜莊教授和王奇生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張振義，〈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0年7月16日，4版。

已經無法擔當抵禦外侮之責，只有培養以愛國爲己任的「新國民」，方能使中國免於瓜分與亡國之危。然而他們當時對此議題只停留在討論階段，沒有付諸行動。到了 1949 年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共產黨以強勢的國家力量來推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其規模之大，涉及之廣，動用人力之多，遠非過去一群在野知識分子單靠著書立說的薄弱力量可以相比。

對毛澤東而言，革命不只是政權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一場從根做起的社會改造。革命不但要改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連風俗習慣、道德、思想、行爲模式、價值觀念等都應該隨之改變。因此，毛取得大陸政權之後，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新的人生觀，並且能夠配合當前政策的推展，成爲中共的重要關懷。1950 年代的中國流行一句口號：「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以俄爲師，蘇聯女拖拉機手所提供的典範，也成爲教育中國婦女的新榜樣。

當今研究 1949 年以後中蘇關係，焦點多放在探討上層政治或國際關係方面。對於中共建國初期全面學習蘇聯這一政策的宣傳與落實，及其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鮮有學者予以注意。²另一方面，從晚清提倡新國民（新國母），到五四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再到

² Mineo Nakajima,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Taipei: Caves Books, Ltd. Reprinted, 1989);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borah A.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孔寒冰,《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沈志華的《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是大陸學者中研究中蘇關係的一個突破，該書不但分析上層政治，而且涉及政策落實與民間反應。

1930-1940 年代左右派爭論新婦女形象，所採用的論述均不離國族主義的大帽子。中共革命成功後，其婦女政策亦然。1960-1970 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受中共有關文化大革命宣傳的影響與資料的限制，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帶來婦女解放。³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80 年代的西方學者開始修正先前看法，認為所謂婦女解放，並非事實。原有的男女不平等反而因為共產革命而更強化了。⁴他們批評過去的學者很少探索被視為中共解放對象的婦女的真正感受，不問她們是否覺得已經生活在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遑論進一步追問這些婦女本身所瞭解的男女平等概念是什麼。近年來西方學者已經有所補救。他們開始就婦女如何瞭解與回應官方有關婦女解放的宣傳進行討論。⁵反觀中國大陸學界，在毛澤東時代根本談不上研究，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所謂「研究」完全跟著官方路線走，大聲高唱婦女已經得到解放、婦女撐起半邊天的曲調。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之後的 80

³ Sheila Rowbotham,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4); Judith Stacey, "When Patriarchy Kowto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Family Revolution for Feminist Theory," *Feminist Studies* (April 1975), pp. 64-112; Delia Davin, *Women 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Claudie Broyelle,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7); Eliz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⁴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hyllis Andor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⁵ Babara Entwisle & Gail E. Henderson, ed.,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回顧西方學界對二十世紀中國婦女研究的最新論文，詳見 Gail Hershtatter, "State of the Field: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4 (Nov. 2004), pp. 991-1065.

年代，才慢慢摘掉國族主義論述的帽子，開始從婦女自身的角度及其利益來分析婦女問題。⁶

本文以女拖拉機手的宣傳與實踐為個案，探究中共國族主義論述下的新婦女典型，並從婦女角度分析其自身體驗；同時闡析中共在學習蘇聯、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過程中，性別扮演何種角色？中共大力宣傳婦女進入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職業場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婦女響應黨的號召，成為拖拉機手之後，實際的工作內容和生活情況與他們原來的期望有何落差？她們是否已經感到男女平等？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官方宣傳中的男女平等，其實質意義何在？

再者，本文將以此案例，比較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蘇女拖拉機手處境。或許有人認為比較理想的中國對照是北韓與越南，而不是蘇聯；因為中國與這兩個國家文化背景相似，進行比較，更能看出中國在學習蘇聯上的特殊性與差異性。但是目前幾乎沒有這方面的中英文著作；有的也只是蜻蜓點水，利用官方資料簡單提及學習蘇聯而已。⁷其次，雖然中蘇兩國的地理環境、歷史發展、文化背景歧異之處頗多，但是中蘇同為大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共同致力於共產革命的時間也最長，兩國領袖莫不希望重振大國雄風，側身強國之林。中蘇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與塑造新人的道路上，所面臨的問題與規模，遠非小國寡民的越南或北韓所能相比。此外，中蘇兩國均曾轟轟烈烈地推出女拖拉機手樣版，卻又幾乎不約而同地

⁶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⁷ Kyung Ae Park,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Korea," *Pacific Affairs* 65:4 (Winter 1992-1993), pp. 527-545;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在 1990 年代初立法禁止女性擔任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背後考慮的因素相似，引人深思。

一、中共建國初期的女拖拉機手宣傳與典型

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澤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式中，豪氣干雲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鼓舞、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他同時也宣稱過去備受壓迫的工農群眾和婦女，現在都可以當家作主了。對中共而言，舊社會統治階級靠剝削工農勞動者致富，輕視勞動；新社會則重視勞動，因為新社會的主人是勞動大眾——勞動越多，生活越得改善。「婦女必須要參加生產，以推進社會的發展，爭取經濟獨立，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關鍵」。婦女只要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就能享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⁸所以，隨著革命的成功，婦女參與勞動生產，就能獲得解放，男女也就平等了。

事實上，男女平等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若要從理論與實踐層次來全面探討男女平等，可以寫出成堆的專書。不過，若將其與勞動相聯，這裡只需指出一點，共產黨相信婦女參與家務以外的勞動，擔任過去只有男性才從事的工作，就證明了婦女爭取到男女平等的地位。女拖拉機手更是典範。

拖拉機的普遍別稱是鐵牛，滿洲國時期在東北又稱為火犁或洋犁。拖拉機象徵農村嶄新與明亮的一面，代表著現代與進步。拖拉機在中國的使用，最早可溯至兩次大戰之間，日本農業移民組成的開拓團在東北進行墾殖。當時德國拖拉機廠蘭斯(Lanz)曾在瀋陽有代理商，出售與維修拖拉機。1945-1947 年，聯合國救濟總署送了將

⁸ 區夢覺，〈怎樣做一個新社會的新婦女〉，《新中國婦女》，創刊號（1949 年 7 月），頁 9。

近 2,000 台拖拉機到中國，其目的並不是要促進中國的農業機械化，而是要協助河南災後重建。1938 年，蔣介石為阻滯日軍迅速南進，曾在河南炸開黃河大堤，引發大水。大水過後，野草蔓生，只有拖拉機可以斬草除根，使農地可以重新耕種。這些拖拉機在犁過幾百萬英畝的土地之後，因為缺乏零件與維修，加上沒有燃料逐漸被棄置。1947 年秋天，聯合國救濟總署被解散，拖拉機站也正式關門。⁹

中共剛剛接收東北之際，曾經重新拼湊組裝從日本開拓團收繳而來的許多殘缺不全的美製、德製拖拉機，用來開荒種地。其後，蘇聯也陸續運送拖拉機到中國，成為中共建國初期拖拉機的唯一來源，直到 1950 年代後期，才有東歐進口或中國自製的拖拉機。

最早的拖拉機手來自開拓團的中、日駕駛員。1948 年 4 月蘇聯製拖拉機運抵東北後，中共建立甯安、通北、趙光、花園、永安、查哈陽等國營農場；進而開班招生，使東北成為中國最早開辦拖拉機班的地區。¹⁰此外，美國左派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亦曾協助中共在河北冀縣成立拖拉機班；當時 72 名學員之中，只有 3 名女性。¹¹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咸認女人不能扶犁，否則會壞了莊稼。中共則以女人能扶犁，而且是能操作機械化的火犁，來展現婦女參與勞動的光榮偉大及新社會的進步與解放。中共認為女拖拉機手代表了婦女告別舊社會的苦惡與封建，迎接新社會的美好與希望。婦

⁹ 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ary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 1, 15.

¹⁰ 楊清海，〈花園農場的初創年月〉，頁 4；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拓荒者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 16-17。

¹¹ 韓丁乃左派世家出身。1945 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身分到重慶，並同毛澤東有過多次會談。1947 年，他又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員的身分到中國。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pp. 1, 8, 15, 28；王永福，周毅文，〈一個老朋友的意見〉，《人民日報》，1978 年 9 月 23 日，2 版。

女終於可以走出家門，與男人並肩工作而沒有羞辱感，這也就是婦女在新中國的翻身。女拖拉機手因此成為社會主義新婦女的代表之一。在官方機器宣傳這種社會主義新婦女之際，也同時意含新中國將成為一個農業機械化的現代國家。

1950年代初期是中共最密集宣傳女拖拉機手的時候，這與形塑中國的新形象和施行農業政策關係密切。1952年底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開始加速推行農業合作化。職是之故，中共在宣傳女拖拉機手之際，也連帶宣傳集體農莊幸福快樂的生活，冀圖以此達到推行農業集體化的終極目標。這段期間官方藉由宣傳女拖拉機手所呈現出來的農村婦女新形象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婦女快樂並自覺地參加生產，且以出外勞動為榮。他們即使遭遇困難，也會不畏艱辛地完成工作。由於當時尚在韓戰的陰影籠罩之下，所以官方的宣傳也強調會開拖拉機，就會開坦克車，這樣就可以保衛祖國。

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的途徑，包括報章雜誌、教科書、漫畫、海報（或稱宣傳畫）、展覽、電影等等。對於文盲佔多數的中國而言，圖像比文字宣傳更具影響力，其中蘇聯電影是最能引起大眾興趣的媒介。例如，電影《她在保衛祖國》（又譯為《巾幗英雄》），劇中的女主角原是一位賢妻良母兼能幹的女拖拉機手，德軍的入侵摧毀了她幸福美滿的生活：丈夫戰死，幼子被德軍的坦克壓死，她憤而組織游擊隊對抗德軍，並親自駕駛坦克殺敵。同樣地，在電影《拖拉機手》劇中的女主角是位女拖拉機隊長，性格明朗，熱情豪邁，志趣高尚，熱愛勞動，竟日穿著工作服。這部拍攝於1939年的電影所傳達的另一訊息是，農民必須學會開拖拉機，也要學會開坦克車，才能對付可能入侵的敵人。同時，劇中也展示了集體農場機械化的優點。凡是拖拉機耕過之處，犁痕深淺適度，整齊畫一。

在眾多蘇聯電影之中，最能展現集體農場的富裕和快樂生活的電影是《幸福的生活》（又譯為《庫班河上的哥薩克》）。影片開始未幾，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堆積如山的各種農產品，令人垂涎欲滴；黃金般的麥浪滾滾，充滿整個畫面，在在宣示了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平日辛勤認真工作且以參與生產為傲的女拖拉機手，在收成之後均換上美麗花俏的衣裳，快樂地結伴遊玩，在市集的每一個角落都能聽到她們銀鈴般的笑聲。此外，劇中還穿插著最令青年男女嚮往的談情說愛。整部片子所呈現的農村生活如此地浪漫與美好，令人不覺心生羨慕。農民的人間天堂捨此為何？爲了配合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共還將這些電影譯成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粵語等，在中國各地播放。

除了宣揚蘇聯集體農場與女拖拉機手的美好生活之外，號稱蘇聯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Паша Ангелина)的事蹟，亦是中共官方宣傳重點。¹²安格林娜在 1930 年代初被蘇聯有關當局捧為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當時史大林實行五年計畫，意圖儘速將蘇聯建設成為現代工業國家。由於農村男性大量湧向城市工廠，農村缺乏勞動力，安格林娜因此被樹立成女拖拉機手的樣板，以便吸引更多的農村婦女投入農業生產。

安格林娜是烏克蘭人，她克服了父兄與朋友的阻撓，在 1930 年（年僅 16 歲）成為女拖拉機手。1933 年她不顧村人的反對，組成一支女拖拉機大隊。1935 年底得到列寧獎章，1937 年底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此後每年都被選為代表，直到她死為止）。1938 年，

¹² 事實上，早在安格林娜之前，蘇聯頓河地區即出現全國第一批女拖拉機手。Sue Bridger, "The Heirs of Pash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Woman Tractor Driver," in Linda Edmondson, ed., *Gender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95.

她喊出「十萬婦女朋友上拖拉機」的口號，從此成為蘇聯家喻戶曉的人物。¹³她將蘇聯宣傳中的農民當家作主、集體農莊的富裕與幸福，完全歸功於十月革命、黨的領導和蘇維埃制度的偉大，而不是她個人的努力或其他特殊因素所致。中國的《人民畫報》、《人民日報》、《新中國婦女》均曾以圖片或文字的方式報導她的事蹟。為迎合教育水準較低的讀者，中共當局還將關於安格林娜的書翻譯和改寫成為章回小說。¹⁴

不過，安格林娜畢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可能沒有足夠的親切感，唯有推出中國自己的女拖拉機手才會更具親和力和說服力。東北是全國最早實行農業機械化的地區，欲從中尋得與塑造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並非難事。1950年，中共即轟轟烈烈地推出中國的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貧農出身的梁軍，是黑龍江省明水縣人。1947年，進入德都縣萌芽鄉村師範學校半耕半讀，她看了蘇聯電影《她在保衛祖國》之後，欽佩與羨慕劇中主角巴莎會開火犁，且能開坦克，從此便夢想當拖拉機手。1948年2月，她報名參加黑龍江省北安拖拉機手訓練班，是七十多名學員中，唯一的女性。最初機師不肯教她，理由是開拖拉機會弄得全身髒兮兮，不適合女性，許多男同學也在旁嘀咕：「女人還來學開火犁啦！」他們都不贊成收女學員，認為女人不能學習這種只有男性才能勝任的工作。

¹³ 據說有二十萬名婦女響應她的號召。П. Ангелина, *Люди колхозных полей* (在集體農莊田野上的人)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с. 21-30, 67.

¹⁴ 〈蘇聯女勞動英雄巴夏·安琪琳娜〉，《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31-32；〈我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戰鬥著——蘇聯第一個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新中國婦女》，1952年第1期，頁25；王大成譯，《安格林娜的故事》（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安格林娜自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陸梅林與海天根據安格林娜的《我的集體農場生活》與《在集體農莊田野上》二書改寫成《集體農場生活》（上海：元昌印書館，1951）。安琪琳娜和安格林娜指的是同一人，譯名不同而已。

幸虧校長支持，方得機師首肯；加上她特別認真學習，不辭艱苦，終於順利完成訓練。1950年6月，梁軍與11名婦女組成了中國第一支女拖拉機隊。她們感謝共產黨與毛主席讓窮人翻身，從此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¹⁵同年，梁軍當選全國農業女勞動模範並參加中國勞模團訪問蘇聯。梁軍的事蹟與形象自然也成了全國主要媒體報導的對象。她的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強調農村婦女開始了新生活。¹⁶中共甚至前所未有地以梁軍為原型印製第三套一元人民幣，到今天為止，也只有梁軍有此殊榮。

此外，中共特別利用訪蘇歸來的農民勞動模範現身說法，回鄉轉述他們的「蘇聯經驗」，以增加宣傳的說服力。據一位東北合作化時期的老模範回憶，凡是參觀過蘇聯集體農莊的農業勞模們，「個個都羨慕死了那天天喝牛奶吃麵包，春耕秋收甚至連擠奶都是機械化的農莊生活。」他們回國後，向鄉親們描繪親眼目睹的蘇聯景象，以致許多原本沒加入合作社的農民，紛紛簽名入社，大大減低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阻力。¹⁷女勞模在訪蘇期間，特別關心與婦女切身的相關問題。曾是內戰擔架英雄，後來在山東成為女拖拉機手的董力生，就注意到每個集體農莊都有很好的產科病房，女莊員生產可休息兩個月，女拖拉機手因工作較重，可以休息三個月。¹⁸有位四

¹⁵ 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6版；〈英雄模範代表們上書毛主席〉，《人民日報》，1950年10月4日，3版。

¹⁶ 〈女拖拉機手——梁軍與她的助手〉《人民畫報》，封面，1950年8月20日，期2；高盧，〈女拖拉機手梁軍〉（漫畫十幅），《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2-3；梅青，〈和女拖拉機手梁軍見面〉，《中國少年兒童》，1950年10月30日，頁18-19；宋雲彬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冊1，頁70-74。

¹⁷ 張鳴，〈「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老照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輯18，頁114-117。

¹⁸ 子岡，〈蘇聯農民的道路就是我國農民的道路——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團員談訪

川女鄉長回鄉後，對鄉親們作報告，她說過去常聽婦女抱怨：「一天三頓茶飯，空了補補縫縫，還要帶娃兒，哪裡還有好多力量搞生產！」因此到蘇聯訪問時，特別詢問婦女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結果都得到相同的回答：「集體農莊有的是幼兒園、托兒所，你愛把孩子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好了。至於縫衣服，都有縫紉機；做起來很快，不想做還可以到合作商店去買。……各個集體農莊都有麵包房，婦女們每做一餐飯的時候，只要燒一點菜就行了。有些廚房還有電氣設備，煮一餐飯快得很。」這樣的情景說明了蘇聯婦女不會受到瑣碎繁重家務的拖累，怎會不積極參加勞動？¹⁹這些女劳模的轉述，也等於為中國農村婦女的未來畫出婦女解放、生活幸福的遠景。

就在官方各式宣傳與女拖拉機手典型的鼓舞之下，各地相繼傳出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的報導。例如，大連的楊桂花、安徽省方邱湖農場的焦天鳳、新疆石河子農場的金茂芳。²⁰他們均克服了教育程度低的困難、村人親友的冷嘲熱諷、外在自然環境的艱難挑戰，毅然決然地走出家門，成為女拖拉機手。金茂芳生動地回顧梁軍對她的影響。她說在家看報導時，看到「全國第一代女拖拉機手梁軍從史大林 80 號上走下來的鏡頭，身材魁梧，臉龐大大的，兩隻眼睛多有神，太陽一照，那樣子就更高大了，跟《西遊記》裡面如來佛在雲端上一樣。她那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我一輩子都記得，就是到

蘇觀感），《人民日報》，1952 年 9 月 14 日，2 版。

19 燕凌，〈只有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婦女才能徹底解放〉，《新中國婦女》，1954 年第 1 號，頁 8。

20 丁深，〈女拖拉機手——楊桂花〉，《現代婦女》，1950 年第 8 期，封底（6 幅漫畫）；焦天鳳貧農出身，先後擔任村、鄉婦女領導工作，1953 年訓練成拖拉機手，1955 年授予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1964 年全國勞模。〈安徽省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焦天鳳〉，《安徽之最》，<http://ahnk.com.cn/jtwh/jtwh-31.htm>；田流，〈兩個蒙族姑娘〉，《人民日報》，1952 年 6 月 12 日，3 版；秀珍，〈京郊五里店國營農場的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2 年 3 月 8 日，2 版。

我開拖拉機後，我下車子的時候都要模仿她的樣子。」²¹女拖拉機手的形象能夠和如來佛相提並論，怎會不讓婦女砰然心動？

女拖拉機手典型的出現等於將社會主義新婦女的形象具體化。她與當時中共大力推行的另一位社會主義新人典型——蘇聯英雄保爾²²具有共同特質：均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無私無悔地獻身於黨；均有鋼鐵般的意志，能夠刻苦耐勞，戰勝一切困難；均致力於革命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唯一宣傳內容有別者，乃在於男女平等，女拖拉機手典型還象徵著婦女解放。

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並沒有像宣傳蘇聯英雄保爾那樣積極動員，也沒有利用共產黨的各種外圍組織如共青團、婦聯等舉行座談，或廣邀女拖拉機手到各校演講招攬新手，²³或在各地廣為開設女拖拉機班等。究其箇中原因，決策者考慮的不是性別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中國實際環境與發展的限制。這將是下一節闡析的重點。

二、婦女勞動實踐與機耕化發展

中共建國之後，雖然官方極力宣傳勞動神聖偉大，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生產；但在實踐上卻出現矛盾現象。那就是在理念上提倡男女平等，工作上要去性別化；在實踐上卻又重男輕女，

²¹ 張呂、朱秋德編著，〈優秀的女拖拉機手〉，《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頁90-91。

²² 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12期4（2001年12月），頁25-74。

²³ 只有少數女拖拉機手如梁軍曾在大專院校駕駛拖拉機表演。據梁軍說，這樣的表演是為招生。1952年的五一勞動節之後的數天，全國總工會安排來北京參加慶祝大會的勞模到各地參觀，其中包括在清華大學校園看梁軍開拖拉機的表演。李霞影，〈幸福的回憶——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江南大學報》，www.jnrain.info/indxb/83wenxue.html；2004年8月2日，筆者在哈爾濱訪問梁軍。

甚至強調性別分工。表面上，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似乎證實了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在邀集女航空人員、女拖拉機手、女電車司機座談會上所說的話：「新中國第一批婦女新人物的實踐證明了在今天凡是男人可以做的工作，婦女同樣可以做。」鄧穎超進一步說明中國婦女在中共建國之後的勞動成就：「男女平等的權利，正在逐步實現。過去很少婦女或者沒有婦女參加的重工業、交通事業、國防建設等方面，也出現了新型的婦女，如女盤旋工，電車、汽車、火車的女司機，女航空員及跳傘員等等。」在國營農場中也出現了女拖拉機手和女場長。她們為中國婦女開闢了參加祖國建設的寬廣道路。²⁴中共藉著頌揚這些社會主義新婦女勇於進入傳統男性的工作領域，來宣傳勞動的光榮偉大與男女平等。同時，官方也宣傳婦女唯有從事積極又自覺的勞動，才能享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婦女必須先有經濟獨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社會和家庭各方面和男人一樣獨立，而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²⁵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中共試圖以婦女的經濟獨立與去性別化的工作來彰顯男女平等的理念。

不過，在實踐男女平等這個理念的同時，中共也設定了一個關鍵性的前提：婦女勞動要「事事從國家需要，從集體利益著想。」婦女眼中應該只有黨國的利益，沒有個人前途、榮譽和報酬的盤算。²⁶換言之，新中國的婦女典範，除了要走出家門，熱愛勞動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聽黨的指揮。有了這樣的前提，中共可以視實際情況的需要，隨時「調控」婦女進出勞動場域。

²⁴ 〈全國民主婦聯邀女航空人員等座談〉，《人民日報》，1952年3月15日，1版；鄧穎超，〈新中國婦女前進再前進——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週年而作〉，《人民日報》，1952年9月24日，2版。

²⁵ 〈社論：用新的勞動態度，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祖國〉，《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2號，頁6-7。

²⁶ 〈熱愛勞動是社會主義的高貴品質〉，《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4號，頁4-5。

正因為有上述的前提，中共在處理婦女出外勞動的工作問題時，會出現先男後女與性別分工的現象。例如，中共剛取得政權之際，其實並不特別鼓勵女性進入職場。這是因為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共立即面臨安置復員軍人的問題。即使其後有三年的韓戰，但問題依舊。在城市裡，如何安排復員軍人的出路與日益增多的高小以上畢業生就業，已經令有關當局十分頭痛。男性勞力既已過剩，若再鼓勵婦女出來就業，無異雪上加霜。因此，中共透過各種管道，安置無業男性，並鼓勵高小以上畢業生回鄉或下鄉上山。1956年，勞動部長馬文瑞聲稱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已基本解決，城市中閒散的男勞力已極少。姑且不論馬文瑞所謂的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是否屬實，他也不諱言若干城市的閒散勞力有90%以上是婦女。²⁷由此可見，官方所謂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指的是城市男性的工作問題，婦女的就業問題並不在官方考慮之內。馬文瑞勸告那些已經接受官方宣傳，認為不出外工作就是恥辱的婦女，應該耐心等待國家的安排，或從事無償的義務工作或社會勞動。正因為要解決男性就業問題，馬文瑞向婦女喊話：「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份，搞好了家務，對黨的勤儉持家的號召身體力行，同樣是光榮的。對有子女的人說，家務勞動的責任還是很重大的。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安心的工作和學習，也是對革命的貢獻。……一個有覺悟的同志，應當從如何對革命事業有好處來考慮問題，來解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²⁸簡言之，婦女應以家庭為第一優先，出外就業是男人

²⁷ 馬文瑞，〈進一步地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4。據蔣永萍研究，1949-1957年屬於中國城市婦女不完全就業期。蔣永萍，〈50年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的回顧與反思〉，《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152-162。

²⁸ 馬文瑞，〈關於幹部下放進行勞動鍛鍊和參加基層工作的問題〉，《勞動》，1958年第1期，頁8。

的事。馬文瑞這番談話，等於推翻原來官方就業去性別化的立場，回到鼓吹傳統的性別分化：男主外，女主內。可見官方處理就業問題的原則是：先城後鄉，先男後女。因此，凡是具有「政治正確」觀念的城市婦女，都應該欣然接受黨對勞力需要的調控與指揮。

同樣地，官方對待農村婦女勞力的態度，一如城市，需要接受黨的調控。中共主張在勞力缺乏地區，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和其他生產勞動，沒有勞動習慣的也要養成勞動習慣。在勞力過剩的地區，則發展婦女從事林牧漁業和手工業，鼓吹飼養家禽家畜等是最適合婦女的工作；這樣的態度無異又回到傳統的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50年代的陝西爲了增加棉花產量，省委與省婦聯特別強調棉花豐產與棉田管理乃是最適合婦女特質的工作：婦女心細手快，更能符合棉務工作與管理的繁瑣與細緻。這樣的強調所產生的結果是鮮明的性別分工：粗重的種棉與拔棉桿由男性擔任，細密的摘棉與棉田管理完全由婦女擔任。²⁹

再者，由於農村支援婦女出外工作的配套措施嚴重不足，中共必須特別強調不能因爲參加生產而置家務於不顧。「參加生產是光榮的，擔負家務勞動也是很必要的。」在1950年代初期，即便大城市如上海都有托兒設施不足的問題，遑論落後的鄉村。有關當局只好再三呼籲農村婦女不可輕忽家務和養兒育女的責任。官方提出解決家事與農務衝突的辦法是：「農閒與天雨時，準備好全家衣服鞋襪；農忙時，從事農業勞動。」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³⁰官方並沒有建議農閒期間男性也應該分擔家務，也等於是說家務仍是女

²⁹ 高小賢，〈「銀花賽」：50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頁153-171。

³⁰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當前農村婦女工作的指示〉，《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8號，頁3。

人必須、也應該承擔的「份內職責」。這樣的思維與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如出一轍。蘇聯實施工業化之後，高層領導感到勞動力的短缺，因而逐漸由理論走上實踐，促使婦女參加勞動生產。不過，即使蘇聯比中國進步，蘇聯政府能夠提供婦女減輕家務負擔的支援依然十分短缺。既然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婦女勞力，因此史大林時期的政策一直強調家庭與工作可以兼顧，而且這個政策是不容挑戰的。³¹

除了中共官方實際上對農村婦女勞動的實踐有性別分工的傾向之外，農村中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也是阻礙婦女出外勞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安徽瀘江縣的婦女向來不參加生產。偶而下田，就被譏笑。有一婦女下田幹活，天忽然下雨，有人就說是因為婦女下田的關係。這位婦女被說得滿臉通紅，以後再也不肯下田。也有婦女想參加生產，卻沒人帶小孩，地方幹部也不幫忙解決問題。³²類似之例，不勝枚舉。自然，中國幅員廣大，婦女參與勞動的地域性差別極大。東北土地多，當地婦女參與勞動的比例要比南方婦女多。據官方統計，1949年東北全區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佔女性勞力的60%，1952年達到80-90%。其次，中國農村經過連年戰爭，即使有勞力不足的問題，由於傳統觀念作祟，農村婦女出外從事的工作仍以非技術性、非重體力的工作為主。根據統計，在1952年，隨著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展開，全國約有30-40%的婦女參加了農業互助組的生產。³³中共則期望從1956年開始，在七年之內，要求農村男子全勞動力每年至少做250個工作日。並積極發

³¹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19.

³² 〈讀者來信〉，《人民日報》，1952年10月29日，2版。

³³ 黃西誼，〈中國當代社會變遷中農村婦女經濟身份的轉換〉，《社會學研究》（北京），1990年第6期，頁62。